

◎邓红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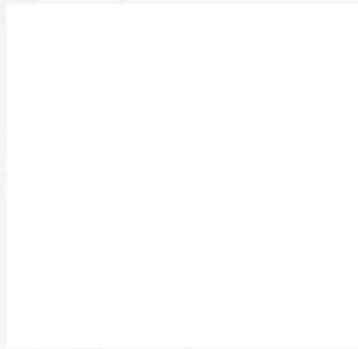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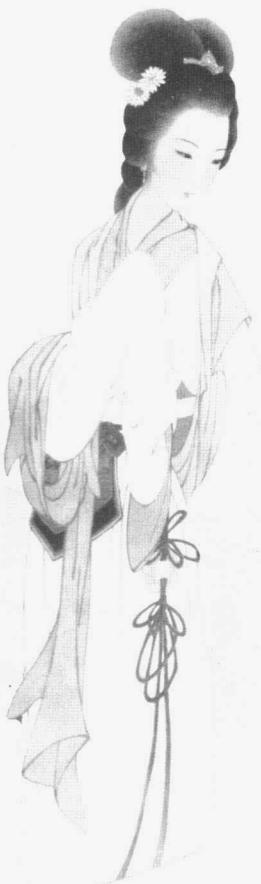
李清照新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邓红梅 著

李清照新传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李清照新传 / 邓红梅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10
ISBN 7-5325-4143-6

I. 李... II. 邓... III. 李清照(1084~约1151)
—传记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 第055441号

李清照新传

邓红梅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 (1) 网址：www.guji.com.cn
- (2) E-mail:gujil@guji.com.cn
-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经销

浙江省临安市曙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装订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 124,000

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00

ISBN 7-5325-4143-6

I.1811 定价:16.00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0571-63781028

引　　言

一代词宗李清照，是齐鲁大地孕育出的最杰出的女儿。她不仅在中国古代众多的女作家中，处于最突出的文学地位，即使在基本上由男性作家构成的显性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地位稳定、不可忽视的亮点。自宋以来，喜爱她的作品的读者可谓多矣！“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对于她的文学成就的评价可谓高矣！如说她的词“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如说“词体大略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婉约以易安为宗”；甚至有论者认为，她和五代词人李煜是词国的“男女皇帝”。时至今日，她的作品不是依靠文坛的炒作，而是凭借其本身的艺术性和感染力，被翻译成英、俄、法、德等多国文字，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爱好，甚至火星上的一座环形山，也以“李清照”来命名。这位毫无疑问占据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第一把交椅、与男性词人平分秋色的女作家，是齐鲁文化的深厚传统孕育出的奇珍异宝！

在展现造就了她的文学成就的坎坷一生之前，还是先来为她剪一幅侧影吧：

李清照(1081—1155?)，是北宋文章名流李格非的女儿。她的母亲王氏为宰相、岐国公王珪长女，早卒。继母为状元王拱辰二夫人薛氏长孙女，颇有文才，为《宋史》所记载。李清照十九岁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二十六岁起即宋徽宗大观二年(1108)，她与丈夫及丈夫全家退居于山东青州。十二年后即宋徽宗宣和二年(1120)秋，赵明诚被起用为莱州太守。宣和三年秋，李清照追随丈夫至莱州任所。后又相从于淄州任所。她的前期生活，

虽受党争的牵累，起伏不定，但婚后伉俪情感投契时多。

靖康之变后，赵明诚于靖康二年（1127）春，载着他们前期搜集整理的十五车金石文物书画等，渡过淮河、长江，先期南下江宁奔母丧。七月，赵明诚起复知建康府。十二月金人攻打青州时，李清照独自怀抱蔡襄书法精品《赵氏神妙帖》南来，过镇江时，遇山东兗州盗贼张遇攻陷镇江后的骚扰，而能将《赵氏神妙帖》完好携往建康。建炎三年（1129）八月，赵明诚病逝于建康（今南京）。从此，李清照孤身一人，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和病体痛苦，漂泊江南，流徙于江、浙两地。怀着对往事和故国的深情追忆，怀着对亡夫的不尽思念，怀着对北伐的深沉梦想，在遭遇了金石散亡、再嫁匪人的巨大不幸之后，结束了凄苦流离的后半生。

〔附注〕 关于李清照的生年，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说法。1. 为流行之元丰七年（1084）说。持之者为王学初、王延梯等多人，所据为《金石录后序》“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及“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两段意思。以为“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是李清照“归赵氏”的年龄，又据杜甫诗“陆机二十作文赋”，定李清照十八岁出嫁，上推十七年为元丰七年（1084）。再将此生年说，与洪迈《容斋随笔》云据当时金石收藏家王顺伯所藏原文撮录之《金石录后序》中“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的记载相证明，认为易安生于1084说不可易。2. 为元丰四年（1081）说，此说由胡适《宋词选》首陈，近有毕宝魁等人重新主张。所据则以《金石录后序》“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及通行本之末署“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确定李清照作此序时为绍兴二年（1132），此时为“过蘧瑗知非之两岁”即五十二岁。上推五十一年，即为元丰四年（1081）。按：笔者采纳元丰四年（1081）说，还因为以下两点：（1）绍兴二年也是李清照与张汝舟“讼而离之”的离婚之年，有

历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为证，详见后文。遭此变故，易生怀旧之心，此是《金石录后序》写作的心理动因。又：绍兴二年为壬子年，与玄黓岁即壬年的干支纪年相合。(2)元丰五年(1082)五月，其外祖父王珪已逝世，李清臣所撰写的《王珪神道碑》：“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非，早卒。”据此，如云清照生于元丰七年，显然与生母王氏卒于元丰五年其父卒期前不合。按：至于由元丰四年(1081)说推出李清照婚年不在十八岁，而在二十一岁；而从婚年二十一岁到绍兴二年李清照五十二岁之间只有三十一年，与“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的时间不合，笔者以为李清照的“忧患得失”，自其十八岁时(1098)计算，殆因此年元祐旧臣黄庭坚被贬四川戎州、秦观被贬广西雷州，而她却与赵明诚订婚约故。本为元祐后人，而今却订婚约于新党后人，清照应产生复杂心理感受，此即忧患之始也。不必指十八岁为其婚年，正如五十二岁亦非其死别明诚之岁。又或有云，李格非于元丰四、五年间丧妻后，立娶王拱辰二房夫人薛氏之长孙女王氏，生清照。按：此与事实有忤。具体如下：[1]后文引王拱辰夫人薛氏墓志铭，言其三孙女“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二人在室。”当李格非于十一年(1093)后任秘书省官时，薛氏犹有二孙女未嫁，则已嫁者年龄也不可能太大。[2]李格非爱惜羽毛，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1082年前后在郓州教授任上，曾拒绝上司兼官兼薪之美意，则他既娶得岐国公之女，亦难于妻死后遽娶新妇；况以他其时不过五百钱的薪俸，亦难在丧妻后急备彩礼；而王拱辰亦是当朝状元、翰苑名流，其家亦难嫁女而不依礼。[3]李清照年轻时著《词论》，于秦、黄词多所许可，而于王拱辰连襟欧阳修词则少许可，似非亲故所宜。[4]李清照《金石录后序》所提及亲人，唯一“弱弟”。“弱弟”本有两意，一为德行不足之弟，一为年龄悬殊之弟。而其所指，则应为“年龄悬殊”之弟，此弟当为李格非多年后所娶之王拱辰孙女所生。凡此种种，可证李清照为岐国公之女所生。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百脉泉水捧明珠	1
一、故里	1
二、家世	3
三、童年的想像	17
四、词女的婚姻	24
第二章 夫妇擅朋友之胜	39
五、神仙眷侣	39
六、“党人子弟”	47
七、归来情深	66
八、第一夫人	80
第三章 物是人非事事休	115
九、乱中南渡	115
十、“杞妇悲深”	128
十一、金石沦亡	137
十二、再嫁匪人	147
尾声：别离的脚步	158

第一章 百脉泉水捧明珠

一、故里

李清照是哪里人？以往的典籍往往泛泛记载她是济南人，济南也为孕育出这么杰出的女儿而自豪。四百年前，自然人文风景荟萃的济南大明湖边的柳絮泉，已被当成是李清照故居。

清代乾隆时山东诗人田雯的《古欢堂集》中，有《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居》诗这样写道：“跳波溅客衣，演漾回塘路。清照昔年人，门外垂杨树。沙禽一只飞，独向前洲去。”今天，郭沫若题写了“一代词宗”之匾额的李清照纪念堂，和以其《漱玉词》命名的“漱玉泉”，也依然静待在趵突泉旁，接受着人们的景仰。但是，此前的明清两代济南地方志，都没有记载这里是李清照的故居。

根据康熙重修《山东通志》所载李格非撰写、并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明水镇西挖掘出来的《廉先生序》碑及《珊瑚网》卷三所收录元祐庚午三月“绣江李格非题”写的一段书法等文献^①，可以确认李清照是山东省章丘市明水镇人^②。特别是在

① 汪珂玉《珊瑚网》卷二记李格非言云：“与人简牍，事尽则言止，至唐末尚然。元祐庚午三月丙子绣江李格非题。”

② 按：近年齐鲁书社出版《石头上的文献——曲阜碑文录》169页有“提点刑狱、历下李格非，崇宁元年正月二十八日率遁、迥、远、迈，恭拜林冢下”。有人据此认为李格非是济南历城人，不确。证据有四：1. 宋时，历下非专指今历城或济南市区，而是齐州的代称。如《宋诗纪事》卷三二范子正《寄季颐师，颐谪齐州》：“历下故人今何在？音书久已隔寒喧。”

明水镇西三里廉家坡村发现的《廉先生序》碑上，还有李清照的堂兄李迥于宋徽宗宣和五年追记序文来历的题跋，清楚地显示了这个家庭的位置细节。他说自己小的时候，曾经和现在俱已下世的父亲及叔父李格非“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水净，得先生之居，谒拜先生。先生既歿，先考评其为人，先叔作序，以纪名实”。李迥跋中所言“先叔作序”，即指李格非所写的《廉先生序》。李格非在序文中称廉先生为“同里人”，末后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三日，绣江李格非文叔序”。绣江为章丘之别称，因境内有绣江河而得名。依据以上资料，可知廉先生为明水镇人，而清照的父辈与之同居明水，相距仅有三里之远，同时又称之为“同里人”，因而可以认定李格非确为章丘明水人。

此历下即指齐州，而宋代齐州所辖，据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包括历城、临邑、临济、章丘、禹城、长清六县。2. 绣江只在章丘境内。《山东通志》卷九：“绣江亭，在章丘县东南绣江之滨，金元好问、张子钧、张飞卿觞于绣江亭，即此。”又本书卷三五之十二：“涓河一名绣江，在章丘东一里。源出会仙山下，合百脉泉、东西二麻湾，西北汇为白云湖，而入小清河。”3. 元好问《遗山集》卷五《泛舟大明湖》诗：“长白山前绣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大明湖上一杯酒，昨日绣江眉睫间。”又同书卷八《绣江泛舟有怀李郭二公》诗：“荷花如锦水如天，狼藉秋季拥画船。长白风烟最潇洒。”俱言绣江在“长白山前”。此长白山，据《山东通志》卷六，跨四县境：西南为章丘，东南为淄川，西北为邹平，东北为长山。又同书卷三四《济南行记》：“凡济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为上，金线次之，珍珠又次之……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灵泉庵者三，泛大明湖者再。遂东入水栅，栅之水名绣江，发源长白山下，周围三四十里，府参佐张子钧、张飞卿觞于绣江亭。”4. 章丘在春秋战国时代属于古齐国历下邑，其境内东平陵城（今章丘县平陵城），兴起于春秋战国时，至汉代，更是郡治所在。李格非积学渊博，曾著有《史传辨志》、《书战国策后》、《破墨癖说》、《礼记精义》等历史与先秦诸子的研究著作，对于先秦齐、鲁二国的史迹十分熟悉，他去拜祭先秦时代的孔子时，用先秦时候章丘属邑名，可谓顺理成章，兼能发思古之幽情。

章丘位于济南和淄博之间，宋时属于齐州济南郡^①。明水在章丘市东南，它北接黄河，南依泰山山脉。其地山青水秀，泉水清澈明净。泉水之盛，可与济南相媲美。潆洄前后的绣水泉、明水泉、西麻湾泉三大泉系之水，汇而北流，注入长达几十里的绣江。

在注入绣江的诸泉系中，又以“方圆半亩许，其源直上涌出，百脉沸腾，状若贯珠，历落可数”^②的百脉泉为首，这一与济南趵突泉齐名的著名泉水^③，在明水镇东。它犹如空谷佳人，幽处在宁静安稳的小镇旁，汩汩滔滔，长流不断。据说李清照的故居，就在百脉泉西南不远处的义仓一带。

在明水镇东边，三十里的绣江水，一望无际。伫望东北，绵延不尽的长白山爽气朝来。元代诗人元好问，曾以“长白山前绣江水，展放荷花三十里”等诗句，表现了对于此间风景的绝佳印象。这里，水中莲叶田田，远山青崖翠发。茂林修竹，匝地皆是；菱瓣莲花，应时而有。真是风景清嘉，人物风流。古人常说，山水清胜之处，往往特产佳人而绝代，如西施之在苎罗，昭君之在香溪，这是山水聚其灵气、钟情于人的表现。明水镇上清润的百脉泉水，也奉献出了一颗最清丽照人的珍珠——绝代才女李清照。

二、家世

这颗动人的明珠，是怎样养成的？在展开李清照的生平之

①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九。

② 见清代道光间刊本《章丘县志》。

③ 《齐乘》卷二云：“盖历下诸泉，皆岱阴伏流所发，西则趵突为魁，东则百脉为冠。”

前,有必要先来考察一下她的家世。因为在那个女性没有社会角色的时代,家族的遗传以及家庭的教化培养,几乎是形成一个女子精神特征和文采修养的全部前提。这位后来颇有士大夫的风标,能饮扶头酒,喜作险韵诗,爱好活火分茶、焚香读书,不惧臧否人物,在人格上十分倾慕“千古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女词人,生活在一个文学气氛浓郁的家庭里。

她的父亲名李格非(1051?—1111?),字文叔,是北宋文章名流。

这位出生于明水镇上一位不知名官宦人家的儿子①,自少年时代就不随流俗,在当局还以诗赋取士的时代,受到以管仲之学重视实效、不尚虚名为核心的齐文化影响的他,却十分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他不学吟诗作赋,而是专心研究被当成是儒家政治制度设计的思想基础的经典著作《礼记》,撰写成几十万字的《礼记说》。他那俊迈超常的人品和力求经世致用的态度,从青年时代的这一举动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他在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进士及第②,那时大约二十六岁左右。

李格非中进士后,先担任冀州(今河北冀县)司户参军这一低级户口管理官员的职位。任期届满,按照当时的制度许可,他参加了朝廷选拔学官的考试。当时的学官,需具备文才优长、德行无亏即“德才兼备”的高标准。李格非在考试合格后,调任为郓州(今山东东平)教授。大概是在进士及第后,他以自己的“德才兼备”和“积极有为”的态度,引起当朝宰相、加封岐国公的四川华阳人王珪的注意和好感,被王珪选为东床快婿,娶了王的长

① 李清照《上枢密韩公诗二首序》:“有易安室者,父祖皆出韩公门下。”说明其祖父也是北宋的一位官员,惜不知其名。

② 见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八。

女为妻。

王珪的长女，也就是清照的母亲，可能是因为难产的缘故，在王珪元丰五年（1082）去世前就已“早卒”^①。那时，李格非还处在鄂州教授这个清贫的学官职位上。李格非的上司大概因为他是当朝宰相的女婿的缘故，悯恤他的清贫，打算让他再兼一个官职，被清正廉洁的李格非所辞谢。李格非虽然处于清贫地位，但却能志气不堕，廉洁自守，其人之正派、刚毅，也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坚决辞谢，也与他爱惜羽毛，珍惜自己的政治前途有关。

元丰八年（1085）九月十三日，李格非在鄂州教授任满之后回到故里，探望已经四周岁的女儿清照和其他亲人，并为家住明水以西廉家坡村的已故隐士廉复撰写《廉先生序》一文，叙述其平生，表彰其为人，意在传扬其不朽。

过了年，也就是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李格非“入补太学录”，即京都太学里的录事官，这是太学里比较低级的学官。三年之后即元祐四年（1089），李格非升为太学正，这是太学里的中级学官。这时候，他一面尽力于公务，一面利用闲暇时间到自己购买并经营的“有竹堂”中读书写作，学问文章均大有长进^②。他的同乡、“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见证了他这一段自我砥砺的日子。为官太学正期间，他最快乐的事，是备酒置菜，请晁补之这样的朋友来作深夜倾谈。李格非言辞滔滔，议论雄辩，让朋友们十分佩服，以为他的才情浩瀚奔腾，有如枚乘笔下的

^① 李清臣所撰写的《王珪神道碑》：“女，长适鄂州教授李格非，早卒。”见王珪《华阳集》附录。

^② 见晁补之《有竹堂记》，《鸡肋集》卷三十。

“要言妙道”，能疗人沉疴^①。

也就在这一阶段，他曾和晁补之、张耒及同为太学正的宋遐叔等人，到迎祥池（凝祥池）荡舟，观赏罕见的黄色荷花^②。

由于他专心供职和著述，也有必要的出游和交往，李格非文名渐显。元祐六年（1091）左右，他得以再转一官，为太学博士，这是太学中仅低于最高长官国子祭酒的位置。同年十月，哲宗驾临太学，与李格非等一班太学学官们君臣唱和，李格非为此撰写了《元祐六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元祐八年（1093）左右，李格非入为馆职。大概是在这时，他被前朝状元王拱辰的第二位夫人薛氏一门相中，薛氏将自己的长孙女嫁给了他^③。

李格非所做的馆职，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之职。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的职位，秦观就曾做过。在宋代，这一馆职一般会带上承务郎以上的官阶，属于朝廷备用的文官系统中的英俊之才。李格非在这一职位上所带的官阶，为左奉议郎。

秘书省馆职虽属于历代国家图书馆中的文官系统，但一向颇受朝廷重视。自东汉设立馆阁制度以来，馆职人才选任严格，不是科举高中甲科前茅的人，或者是国子监相关级别的学官，就不予选用。在职能上，馆阁官员并不仅仅掌管经籍的刊行与佚

① 参见枚乘《七发》关于“要言妙道”治疗太子疾病的描写。

② 见晁补之《次韵太学宋学正遐叔考试见寄》，《鸡肋集》卷十一。

③ 1976年3月，河南伊川县城关镇窑底村，出土王拱辰及他的二位夫人墓志共三方，其中提到王拱辰的第二位夫人薛氏，有孙女三人，“长适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二人在室”。又：二十世纪前后山东省济南市外环路施工新出土《贺仅墓志》题：“左奉议郎、校对秘书省黄本书籍李格非撰，和州防御推官、知凤翔麟游县事李辟非书。”可证李格非确曾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官员。

书的搜求,更可以参与朝政的建言和谏言,故而历来是文人向往的清贵之地。在宋代,甚至县令级别的官员人选,也可以由馆阁大臣推举,况且一人馆职,易得天下之名,在宋代更是特别荣耀的职位。南宋学者洪迈曾在《容斋随笔》里评说道:“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

做了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并任左奉议郎的李格非,以其“如茧抽绪,如山云蒸,如泉出地流,如春至草木发”^①一样的自由舒卷文风,被时任端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的当世第一文豪苏轼所赏识,与“苏门四学士”交往颇多,交谊也深。李格非和廖正一、李槽、董荣一起,被称为“苏门后四学士”^②。与苏轼诸才士暇日相从,从汴京到洛阳,游览观察,极唱和之乐。同时,在往复观览的活动中,他也感受到了北宋后期士林乃至整个中上层寻欢作乐、不负责任的风气。这使他忧心忡忡。他写下了《洛阳名园记》,表达自己的感慨和忧虑。在这部书里,他考察一座座洛阳园林的兴废,发现它们与洛阳的兴衰息息相通;他展眼而望,发现洛阳的兴衰又是天下政治兴衰的晴雨表。而此时,朝廷上进用着的王公贵人和高层士大夫们,在李格非的眼光中,都是一些放任个人享乐、以私利私名为追求目标的贪纵无耻之徒,他们已经忘记了自己对国家、民族所应负有的责任,更忘记了天下治乱存亡的大局往往从极小处开始的历史教训。李格非在将当代士林的普遍风气与前代历史进行对比时,发现目前的状态已经接近了唐朝将近灭亡时!这种“临界点”上的焦虑感,让他不能不借《书洛阳名园记后》一发其忧患,一吐其不满。三十年后,“靖

① 晁补之《有竹堂记》,《鸡肋集》卷三十。

② 关于“苏门后四学士”之说,虽有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倡言,但目前学术界尚有疑惑,可参见曾枣庄《论苏门后四学士》文章。

康之乱”果然发生，他所深深焦虑过的隐忧，转眼间已变成现实！

此时他的思想更为成熟，以天下为怀的心胸也昭然若揭。如果政治上的机遇能够适时到来，他绝不会是无所作为的人。

在如何对待做人与作文上，李格非有自己的坚持和理解。他特别推崇诚实对于文章的重要性。他举出刘伶的《酒德颂》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作为天下至文，指出他们文章中“字字如肺腑出”的真感情，是他们的作品独立千载而品格自高的根本原因。在作文和做人上，他都认真实践着自己的这一主张。比如他不肯为了自己的仕途发达而背弃苏轼。而他的文章，在某些人眼中，也具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概。可惜的是，在北宋中后期党争愈演愈烈的政治大势下，这样一个诚实有风骨、富有雄才与治世之心的文士，不久就被卷入了“新旧党争”的政治旋涡中。

元祐末年(1094)秋，亲睦旧党的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表示要继承神宗在熙宁、元丰年间的政策。他一面进用新党一派，一面打击旧党中人，苏轼、秦观、黄庭坚、张耒等人在本年纷纷被贬窜，连已经去世的司马光也蒙受新党砸碑之辱。重新登台为相的章惇等人，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特别设立机构编辑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大臣们的奏章，并任命李格非为此机构的检讨官。但是，李格非不愿背弃自己的心志，他拒不就职，不惜为此得罪时宰。同年，李格非被外放为广信军(治所在今河北徐水遂城西)通判，成为此地方上的副职。

在广信军任上，发生了一件颇有意思的趣事：有一个道士，替人占卜祸福偶有灵验，于是自高身价，出必乘车，在当地很有迷惑力。有一天，李格非在路上遇到了这个道士，喝令随从把车中道士捉下来，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然后把他撵出广信军境。这件趣事，除了表现出李格非厌恶邪术、反对迷信的思想，更展

现出他刚强劲直、嫉恶如仇的性格特点。而这一点，我们从李清照的为人和诗歌中，也能很分明地感受到。甚至在她那些写得清畅神骏的词作中，其性格上的刚爽也在起着作用。这是李格非遗传给女儿的鲜明性格烙印。

也许是因为朝廷中亲故的援手，被外放的第二年即绍圣二年(1095)，李格非被召回汴京。他先是被官复原职，任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升任为秘书省著作佐郎。两年之后即绍圣四年(1097)，再由秘书省郎转升为礼部员外郎。礼部员外郎是中书省的正六品属官，掌管礼仪、祭享、贡举的职事。他在两年之内，连获升迁，直到宋徽宗登基的建中靖国元年(1101)，还仕途无恙，担任着礼部员外郎的官职，似乎表明朝廷对他已不再记过。但是，元祐旧臣被纷纷贬窜本身，却让他感受到物伤其类的悲凉。于是，在上一年，他特意远行到湖北樊口的古战场去，名为游览，其实是为从湖北黄州齐安罢官东游的张耒送行。而此时，他将要联姻的亲家、山东诸城人赵挺之已经升迁为吏部侍郎，这是一个掌管中下级官员考核和升迁的职位。

这时已经是李格非政治生涯的顶峰了。在朝廷上，宋哲宗及先后入相的章惇、蔡京对于元祐大臣的迫害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元祐时代的大臣们，有的已经去世，有的正在穷乡僻壤忍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痛苦；在朝廷上，元祐的声音已近于消亡。但是，新党仍然不依不饶，他们很想扩大战果，将苏轼等旧党的影响彻底消灭于人间世。对于接近旧党的人士严惩不贷，甚至这些人的子女，也要被清算出整个统治系统。政治上的“大换血运动”，正以不可遏止的势头进行。

转过年来是崇宁元年(1102)，蔡京入相，赵挺之与张商英分别升任为吏部左右尚书。赵、张在被任命的谢辞里，无情诋毁元祐大臣苏轼等人，对于进用自己的蔡京则百般阿谀奉承。政治

上新党与旧党的积怨，化成了颠倒是非的肆意妄言。几乎是在同时，对于元祐党人的从肉体上的消灭，进化为对于他们精神上的“矮化”，李格非也没有能够逃脱出这一劫。

其实，赵挺之所以对于苏、黄等人怀有恨意，积怨的初始，并不在党派之别，而是由于私人恩怨。赵挺之死后的遭遇，颇能说明这个问题。当他死后，不仅旧党人物长期记恨他的“首陈绍述”之罪，而且新党人物也对他穷究深责：蔡京主政下的两省台监“交章论列”，揭发赵挺之最初是由旧党宰相刘挚所引荐^①，“故力庇元祐奸党”的隐秘事实^②。所以，无论是新党人物，还是旧党人物，都对赵挺之怀有深仇大恨。为此，南宋楼钥曾感慨地说：“呜呼！建中靖国初，徽皇锐意于治，亲擢公为御史中丞。裕陵人物之旧，收用无余。党论虽兴，犹有如公者，迄立于诸公中。谗谤竞起，而主意不移。维持国是，尚有赖焉！”^③“谗谤竞起，而主意不移”，就是认为他在政坛上并没有结党盟派，是个特立独行者。而这，也是当年他走向政治中心以前，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看法^④。

最初，他对于元祐人士，也确实没有明显的恶感。元祐五年，他在由徐州通判任上转为淮东路山阳太守（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时，因为施政简便清明，不以新法扰民，还获得了当地士民的极高赞扬^⑤。但是，早在德州任上，赵挺之想稍稍试行新法，就

① 刘挚即后来为赵明诚《金石录》写后序的刘跂的父亲，曾为宰相。其《忠肃集》卷六《荐人才疏》中有“……赵挺之博学有守，上五人可充台谏之任”诸语。

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

③ 楼钥《跋赵清宪公遗事》，《攻媿集》卷七十。

④ 徐积《送赵守并序》，《节孝集》卷八。

⑤ 徐积《送赵守并序》，《节孝集》卷八。